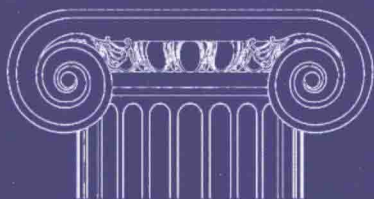


尼采 与 陀思妥耶夫斯基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 Ницше
философия трагедии

关于悲剧哲学的随笔

[俄] 列夫·舍斯托夫 (Л. Шестов) — 著

田全金 — 译

Д о с т о е в с к и й и Н и ц ш е

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ф и л о с о ф и я т р а г е д и и

关于悲剧哲学的随笔

[俄]列夫·舍斯托夫 (Л. Шестов) 著

田全金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俄)舍斯托夫著;田全金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675-3402-5

I. ①尼… II. ①舍…②田… III. ①尼采, F. W. (1844~1900)—哲学思想
②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哲学思想 IV. ①B516. 47②B512.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7047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者 (俄)舍斯托夫
译 者 田全金
责任编辑 古 冈
封面设计 蒋 浩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1
印 张 9.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3402-5/B·932
定 价 39.8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列夫·舍斯托夫及其悲剧哲学(译者序)

列夫·舍斯托夫(1866—1938)是白银时代俄国哲学家,著有《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和尼采学说中的善》(1899)、《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1903)、《无根基颂》(1905)、《钥匙的统治》(1915)、《在约伯的天平上》(1929)、《克尔凯郭尔与存在主义哲学》(1936)、《雅典与耶路撒冷》(1938)等重要著作。在《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中,舍斯托夫论述了陀氏思想转变与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相似和相通之处。表面上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背叛了空想社会主义、“重估”自己年轻时的信仰,并不像尼采那样激烈地要求摧毁一切传统信仰,实质上也不自觉地、“顺便”重估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批判了“一切美好而崇高的东西”。而重估价值的结果就是跌入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泥潭,由希望之城转入绝望之城,由日常性转入悲剧性。舍斯托夫从多个角度研究了悲剧性(反常)与日常性(正常)的关系,但未对“悲剧哲学”的内涵和特点作出清晰的系统论述,只是在前言中提出了“悲剧哲学”是否可能的问题。不过,既然悲剧哲学是非理性主义的,我们也不要求其论述得多么清晰系统。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舍斯托夫对我们整个的文化而言是个预告,不能那么轻易地用最崇高的、但却日常性的‘理念’来理解他。必须用他给我们讲述的悲剧

的经验来体验他。”^①下面笔者不揣浅陋，谨就个人理解对舍斯托夫的“悲剧哲学”略作介绍。

一、从“反常”到价值重估

何谓反常？舍斯托夫未给明确定义。但在《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中，舍斯托夫以《当代英雄》为例，从艺术家和批评家对待理念的不同态度入手阐述了正常与反常（病态）的区别，并为反常作了辩护：

“毕巧林是病症，而如何医治它，知道的只有上帝”。……无论毕巧林们多么难以琢磨，作者也不会将他们送给中庸和规范作牺牲品。批评家恰恰想医治。他相信或应该相信现代的理念：相信人类未来的幸福、大地上的和平、一元论，用普加乔夫的话来说，为了保护吃死尸的乌鸦，必须消灭吃活肉的鹰。鹰和鹰的生活，这是一种“反常现象”……^②

这段话阐述了反常现象与日常现象的根本对立，以及日常性的霸道。在舍斯托夫看来，“正常”就意味着平庸，“反常”才有可能跟创造性、天才等等沾边。莱蒙托夫式的艺术家们不想受制于理念的统治，因而不想医治病人。他们不知“正常”为何物，也就不想知道“反

① Бердяев Н. А. *Sub Specie Aeternitatis*. СПб. Изд. М. В. Пирожков, 1907 г., с. 275.

② Шестов Л. 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I, Томск, Изд. «Водолей», 1996 г., сс. 325—326.

常”为何物，因而不愿为“正常”牺牲独特性、个别性。既然上帝允许毕巧林式的病人存在，艺术家们何必越俎代庖！而现代批评家——正常的人却想当上帝，医治病人，正说明他们是理念的奴隶。

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的正常理念是什么呢？答曰：人道主义。

舍斯托夫认为，陀氏所背叛的人道主义并不新奇，不过是陀氏登上文坛时的流行思想，而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流行思想也就是正常的思想、正确的思想。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人道主义”并非我们一般所谓的仁慈、仁爱、救死扶伤之类，而是取其本义，即文艺复兴以来盛行的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人道主义就意味着人相信人的理性，相信人能凭借自己的理性建设美好的生活，而不需要借助于神的力量。舍斯托夫强调这些思想是从法国传播而来，除了指出其本义外就是强调它拥有启蒙、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等丰富内涵。

舍斯托夫认为，人道主义胜利了，人脱离了神的统治，却转身拜倒在理念脚下。这是什么理念？舍斯托夫说：这些思想是从法国传播过来的，但是，“与人的社会权利的宣言一起带给我们的，作为它的补充（当时是这样想的）和必要的假设，还有世界秩序的自然明晰性的理念”。^①

换言之，与人道主义这个“哲学真理”同时带来的，还有世界秩序的自然明晰性这个“哲学谎言”，还有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傲慢。因为，自然明晰性的理念宣布大自然的规律乃至社会规律不可抗拒、不可变更，实际上也就是宣告人在自然规律面前无所作为：

^① Шестов Л. 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I, с. 336.

谁也没有感觉到,与人的社会权利的宣言(人道精神)同时,还给我们带来了人在自然面前无权的宣言。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任何人更少怀疑这一点。^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了“人道主义真理”,也接受了“世界秩序自然明晰性的谎言”,不论与别林斯基绝交,还是被判死刑、服苦役,陀氏都坚持信仰毫不动摇。但是为什么后来又背叛了人道主义呢?陀氏在1873年《作家日记》中解释说:

不是流放的岁月,不是苦难摧毁了我们。相反,没有什么东西摧毁我们,而我们的信念由于意识到必须完成的职责而支撑着我们的精神。^②

由此可见,陀氏自以为人道主义信念的支持,使他具备了抵御苦难的伟大力量。但舍斯托夫认为,实际上支撑陀氏的不只是“深刻真诚的信念”,更重要的是对“新生活的期待”,“这使他的心免于生锈,这也是他能把随身携带的纯真的‘人道精神’再原封不动地带出苦役营的原因”,^③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像任何人一样不想要悲剧,并尽力逃避它”。^④

在苦役期间,“希望曾不止一次地抛弃过他,而且是长久抛弃。在这样的时刻,当他感到自己确实将永远、将终生与最卑微的人为伍

① Шестов Л. 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I, с. 336.

② 同上, с. 338.

③ 同上, с. 344.

④ 同上, с. 341.

的时候,在他身上诞生了一些新的、可怕的因素,这些因素命中注定在后来发展为完全不同的哲学,即真正的苦役哲学、绝望哲学,发展成为地下人的哲学”。^①

尼采与青年时代的导师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决裂,过程和结果都与陀氏有着惊人的相似。舍斯托夫说:《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1880)是尼采生平“第一次允许自己以其个人的眼光看世界和人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背叛过去的信念而被所有的朋友抛弃、咒骂;而此前的《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和《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却是在作者已不再信仰导师的学说时写的歌颂导师的文章。舍斯托夫说:

为什么需要这样装假呢?尼采解释道,在跟自己的导师们诀别之时,他想为了过去而表达对他们的感激和谢忱。我认为,读者会以为这样的表达感激的方式是不值得称赞的:应该擅于为了真理牺牲自己的朋友和导师。……假如尼采确实地知道离开他们后该往哪儿走,那么他与自己青年时代的领袖们告别时大概不会这样拘礼。我们看到,感激和谢忱没有妨碍他后来写下尖锐地批评瓦格纳的论文,也没妨碍他称叔本华为“老骗子”。^②

尼采的经验提醒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背叛信仰之后还要藕断丝连,在表达新的信念时还要遮遮掩掩,也是因为他在跟导师决裂

① Шестов Л. 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I, с. 345.

② 同上, сс. 401—402.

时,还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等到这些叛逆者大声地、公开地诅咒自己的导师和从前的信念时,他们已经知道路在何方了。

陀氏和尼采背叛信仰的艰难曲折的历程,暴露了日常性的强大力量以及“反常性”本身因此遭受的扭曲。关键是,不仅霸道的日常性要消灭“反常现象”,而且被归入“反常”的事物本身也往往自以为有罪而惶恐不安。舍斯托夫说:

全部可怕之处在于,绝对没有一个活人能够长久地承受一种思想——另一种世界观的可能性。每当他想到现代的真理,他本人就会感到自己脱离了唯一正确的道路而直接走向了反常,虽然现代的真理终究不过是自己时代的真理,而我们的“信念”可能就像我们的最远古的祖先的信仰一样错误。^①

换言之,人们往往误把一个时代的真理当成永恒的真理,而真理是相对的,今日之真理与昨日之谬误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伟大的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也饱受“反常性”这个可怕的幽灵的压迫之苦。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之流都是不得已走进反常性这个悲剧领域的。^② 这个悲剧领域不仅“没有志愿者”,而且像但丁看到的那样,这里也是进去之后就不能出来的黑暗地狱,是无人愿意进入的绝望之城。“到过这儿的人,就开始别样地思考、别样地感受、别样地希望。所有人们感到宝贵和亲切的一切,对他而言变成了不需要的和异己的”。^③可

① Шестов Л. 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I, с. 326.

② 同上, с. 327.

③ 同上, с. 327.

是谁愿意放着康庄大道不走反而去做另类呢？舍斯托夫说：

也许，为现状感到恐惧和渴望回归宁静往昔的痛苦意识还会不止一次在他（陀氏）身上苏醒。但“往日不可追”。船已烧毁，退路已断，必须前进，走向未知的、永远可怕的未来。于是他向前走，几乎不打听等待他的是什么。^①

舍斯托夫描绘的，很像一个死囚走向刑场的景象。退路已断，不得已鼓勇前进。但这个勇敢而又战战兢兢地走进绝望之城的、孤独的求索者，却命中注定被视为疯狂。“人们求助于自己的理想主义和久经考验的认识理论”，让这些久经考验的救命稻草再一次拯救自己。那么，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之类到过或陷入绝望之城的人，能对人们说出些什么呢？

舍斯托夫认为，他们什么也没有“教导”我们，相反，他们还要向读者求救、向读者求教、向读者求证。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说话，并非为了在人们中间传播自己的信念并照亮接近的人们。他们自己也在寻找光明，他们不相信自己感到的光明就是真正的光明，而非骗人的鬼火，或者（更糟）他们紊乱想象力的幻觉。他们把读者作为见证人召唤过来，想从读者那里获取以自己的方式思考和希望的权力，即生存的权力。^②

① Шестов Л. 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I, с. 327.

② 同上, с. 328.

鉴于日常性理念的强大力量，那些进入了绝望之城、背叛了日常性的人，因为害怕孤独、害怕失去根基，不得不“问道于盲”。那么，背叛者如何言说或如何解释自己的背叛呢？他们敢于破坏人际关系的规则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吗？

舍斯托夫指出，“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才能的成熟和增长，他[陀氏]越来越大胆和诚恳地谈论着自己。但直到生命的终点，他都一直用小说中虚构的主人公的名字遮遮掩掩”，还要加上各种各样的“注释和说明”以掩饰真情。^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要作假？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背叛信仰，而在于背叛了怎样的信仰，在于背叛得是否彻底。若是浪子回头或迷途的羔羊回归主的怀抱，从阴暗之城回归阳光明媚的“普世价值观”，也许开头有些痛苦，最后由于自以为找到了牢固的根基，心里一定会欢乐平和的。这样的背叛，不但不用遮遮掩掩，而且可以大书特书。舍斯托夫说：

然而注释对他而言不只是空洞的形式。他本人恐怖地想到，他如此鲜明地描绘的“地下室”，不是某种完全异己的东西，而是他本身的、自己的东西。他本人害怕展现在他面前的恐怖事实，于是集中心灵的全部力量，用随便什么东西、用最早降临的理想掩盖它们。^②

假作真时真亦假！这可真是精彩的心理分析。按照舍斯托夫的

① Шестов Л. 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I, сс. 329—330.

② 同上, с. 330.

见解,陀氏心灵深处隐藏着“地下人”,若公之于众,自己也感到害怕,于是加入“注释”,于是造出梅诗金、阿廖沙跟地下人、拉斯柯尔尼科夫之流对抗,于是在《作家日记》中进行狂热宣传以掩盖真理。也就是说,尼采背叛得比较大胆、彻底,因而敢于大声疾呼重估一切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

二、希望哲学与悲剧哲学

舍斯托夫把陀氏和尼采背叛之后的信仰称为“悲剧哲学”,那么,背叛之前的信仰——人道主义(理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也就可以相应地称为希望哲学。但对于陀氏思想转变的“时机”和原因,舍斯托夫未能作出精确的把握。

舍斯托夫感到奇怪的是,“地下室时代”开始的时候,正是过去的理想(人道主义)即将实现或已经实现的时候。“农奴制倒塌了。一系列预定的和正在执行的改革,预示着将在生活中实现那个别林斯基为之献身的梦想,……文学界举行过盛大的庆祝活动。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人没有分享共同的欢乐。他站在一边,好像什么特别的事情也没发生。不仅如此,他还躲进了地下室:俄罗斯的希望,不是他的希望。这些东西都跟他无关……”^①

人道主义理想(博爱)实现了,吸引力反而没有了?这是什么缘故?必须指出,舍斯托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悲剧性转变的分析,有些随意地运用了日常性的逻辑和论据,因而并不完全恰当。要准确解释陀氏思想转变的“时机”,应该依据时代状况来分析,还要依

^① Шестов Л. 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I, сс. 347—348.

据陀氏个人经验、纯粹个人的经验来解释。

首先,《地下室手记》不是写于“农奴制坍塌”、举国欢庆的 1861 年,而是 1864 年。三年之差,天渊之别。农奴制废除之后的社会状况,与人道主义者的美好想象相比,“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正是这幅讽刺画从反面降低了人道精神的魅力。人权尚未看到,看到的是地主贵族对农民的疯狂掠夺,是遍布全国、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农民之所以暴动,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上当受骗了。假如人道理想变成了现实,难道农民也都是“地下人”,不知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爱苦难甚于爱幸福吗?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两人政治观几乎完全相反)都“看透”了改革的内在欺骗性。既然看透了,还谈什么魅力?

其次,从个人角度看,《地下室手记》构思和写作的时代,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事业、爱情、婚姻家庭都遭受严重失败的时代。对于一部作品的构思而言,个人生活中的具体事件可能要比所谓国家大事起着更加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人可以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视死如归,也可以在反动政府的监狱里坚强不屈直至把牢底坐穿,但个人生命中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有可能对他造成巨大的打击。因此,必须记住,《地下室手记》构思和写作的时代,是作家生命中最黑暗的时代。1863 年,陀氏主持的《时报》被查封,半年之后《时代》创刊,勉强负债经营。这是事业的不顺。《地下室手记》构思时,兄长和妻子都还在,写作期间两人都已去世。兄长不仅是生意上(办杂志)的合伙人,也是他多年来的心理依靠。爱情上的失败也显而易见。他与妻子伊萨耶娃的爱情早已化作流水,与苏斯洛娃的爱情也在饱经波折后彻底破裂。这一切加重了陀氏对“美好与崇高”的否定性理解。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愤怒地谩骂人道主义和浪漫精神。

不过,舍斯托夫虽然未能恰当地解释陀氏思想转变的原因和时机,但对陀氏思想转变之意义的描述是精彩的。他说:

《地下室手记》是公开地(虽然不是很彻底地)与自己的过去决裂。“我不能,不能继续装假了,不能生活在这个理念的谎言之中,而我没有别的真理;随它怎样吧”,这就是这些手记所说的,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注释中如何回避它们。没有一个俄罗斯作家哪怕一次像他那样把“话”说得如此无望、如此绝望。^①

换言之,《地下室手记》是作家绝望的结果。可是,一般来说绝望之后会怎样呢?思想家绝望并非“冲冠一怒为红颜”,背叛民族国家;而是背叛信仰,咒骂曾经坚信不疑的理念。《地下室手记》就是背叛信仰后写出来的,丽莎的形象也是出于“愤怒”塑造的。舍斯托夫说:

跟丽莎的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但手记的全部可怕之处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需要哪怕在思想上、哪怕在想象中做出这样的丑事。他在此从自己身边赶走的不是丽莎。我相信,在他的心灵中总可以找到足够多的直率的怜悯之情,以抑制忿怒和气愤的过分剧烈的爆发。他需要丽莎的形象,只是为了理念,即他终生为之服务的理念。^②

由此可见,舍斯托夫虽然处处拿陀氏生活事件来解释其创作,大

① Шестов Л. 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I, с. 349.

② 同上, с. 350.

有把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等同的趋势,却绝非机械反映论者,而是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形象与生活形象的区别。换言之,舍斯托夫反对索隐、考据、“对号入座”,指明丽莎作为“冲冠一怒”的对象(而非原因),是人道精神的象征,是陀氏赶走人道精神所必需的道具或手法。在《地下室手记》中,“席勒、人道精神、涅克拉索夫的诗、水晶宫,总之,所有曾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灵感动和振奋的东西,都因冰雹般降临的最恶毒、最独特的嘲讽凋零了。因此,理想和激动在他身上唤起的是厌恶和恐惧的感情。”^①当然,一般人不能一直绝望下去,需要抓住几根救命稻草,地下人(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义无反顾”地走向深渊,其超人的胆量值得敬佩。舍斯托夫说:

如果注定有朝一日他青年时代的宽宏大量的梦想实现的话,那会更糟。如果有朝一日人类尘世幸福的理想变成现实,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预先给它以诅咒。直率地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谁也不敢说出这样的想法,哪怕有相应的注释也不敢。人的头脑中要产生这样的想法,需要极大的绝望,而当着众人说出这样的想法,则需要超人的胆量。^②

舍斯托夫对《地下室手记》的精彩分析,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学”的基本特征。陀氏说他的信念(人道主义)支撑着他的精神免遭堕落,舍斯托夫却说是“希望支撑了学说”,即未来新生活的希望支撑他抱持原来的人道主义学说。一旦发现新生活不过是欺骗,原

① Шестов Л. 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I, с. 351.

② 同上, с. 351.

来的学说也就不能不弃之如敝屣了。

新的时代——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们俄罗斯首先发现的“心理学”时代开始了。顺便说说,以“理智和良心”为一方,以“心理学”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直接对立,至今很少有人敢公开承认。^①

在舍斯托夫的语汇中,所谓“理智和良心”也就是通常所谓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即希望哲学,所谓“心理学”也就是非理性主义和绝望的、残酷的悲剧哲学。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分别看作这两种哲学的代表人物。舍斯托夫说:

他(托尔斯泰)小心地从理智和良心抽去了独立自主的权力,使他本人成为万物的尺度。但他渴求理论上的彻底胜利(陀氏所谓“真理的许可”),因此他并不公开破除所有从前的权力,而只是从事实上、逐步地消除它们对生活的任何影响。他该怎么办。在某些场合他还必须维护旧权威的威信和魅力。他当然已不再为它们效力,但它们还在为他服务。^②

这就是托尔斯泰的“理智和良心”与陀氏“心理学”的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坚决地与过去(美与崇高)决裂,显得残酷可怕。在托尔斯泰那里,同样只有个人的痛苦才是痛苦,他人的痛苦于己无关。因

① Шестов Л. 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I, с. 352.

② 同上, с. 355.

此托尔斯泰同样背离了“美与崇高”，与地下人相似，只不过说得比较委婉，只不过一方面在悄悄挖“美与崇高”的墙脚，另一方面却还在利用“美与崇高”为自己服务。

因此，“托尔斯泰伯爵那里还有回归人群的纯粹外表的可能性，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性”，“托尔斯泰伯爵还有希望，而且至死都在同无望这个可怕的幽灵作斗争。这幽灵从未让他长久地安宁过”。^① 舍斯托夫在这里强调了地下世界与日常世界的对立以及天才的孤独，天才为摆脱孤独而渴望成为庸才是“正常现象”。换言之，托尔斯泰假装正常，背地里又嘲笑正常，绝不是虚伪，而是恐惧。由此可见，虽然希望哲学是一种虚假的哲学，但宣扬希望哲学的人却不一定想造假，而只是想顺应“理智和良心”。

舍斯托夫依据《白痴》和《战争与和平》中对死亡的不同描写，指出了希望哲学与绝望哲学之间的对垒。在《白痴》中，依波里特向梅诗金公爵提出了一个“怎样死最合乎道德”的问题。舍斯托夫分析说：

根据长篇小说的构思，梅诗金公爵应该总是出类拔萃的；他应该善于理解一切，并胜利地摆脱最困难的处境。但既然如此，就需要考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安排他与依波里特的相遇，简直就是要嘲笑自己的主人公。难道可能抱着别的目的提出这样的问题吗？……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按照地下人的老习惯，突然抑制不住想对他本人的聪明伸舌头。^②

① Шестов Л. 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ом I, с. 359.

② 同上, с. 360.